

# 我如是研究、如是研究我

方念萱 \*

## 摘要

本文旨在回應楊芳枝教授〈國科會傳播與文化研究學門性別研究前瞻熱門議題規劃成果報告〉一文，從楊文所提本地研究聚焦再現出發，引述他國他地性別傳播研究的範疇、主題、主體以及運動與學術並進的策略，強調性別傳播研究產製的知識必須能為女性所用，研究方法必須沒有壓迫性，而研究所具備的批判性觀點必須同時向主流學術傳統提出質疑，同步反思自己研究的限制與挑戰。

智慧藏

\* 方念萱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E-mail: telnhf@nccu.edu.tw。

〈國科會傳播與文化研究學們性別研究前瞻熱門議題規劃成果報告〉旨在探討本地性別研究過去成果與未來可行之路，由此反映出「從90年代開始傳播與文化研究學門中性別研究的趨勢與轉變」(頁4)。這樣一篇反思過往累積意義與前探可行方向的分析此其時也。就性別研究而言，反思本是研究要件；針對整體研究結果的反思也就等同於針對整個性別傳播研究社群的反思。當前從事性別研究的社群如何思？如何行動？這將是我這篇回應希望從學術研究文本結果的分析進而探問的重點。

作者提出與性別相關的主題的論文數，據此推論性別研究的位置。這從「產出」的數量來探看的邏輯或可看出當下的態勢強弱，但是從「產出」的數字比較難以看出的是，就學術社群而言，在傳播與文化學術社群中從事與性別研究相關的研究者究竟有多少？從事傳播與性別研究的學術工作者的社群有多大？當作者言及「台灣的傳播學似乎還是不太能容納女性主義」時，我好奇的是從事女性主義與傳播研究的學術工作者究竟有多少？投稿量為何？如果相關學術工作者日少、社群萎縮，則純就在學術期刊上歷時的論文數量恐怕還難以揭示傳播學界此一主題研究動態的變化，因為除了在期刊審稿把關上對於女性主義的題旨有所保留的可能性之外，可能女性主義此一主題投稿者希，但是研究相關主題者俱皆佳作，而作品也大多得以發表；也可能投稿者眾，但是研究聚焦偏向特定切面，重複闡釋同一現象，作品由是難以大量得刊。一如作者分析期刊論文議題處所顯示，三十三篇論文中高達二十二篇是有關媒體如何建構特定事件、特定性別意象（與性別政治上的意涵），就此即可看出從事傳播與性別研究的學術工作者專注於分析「再現」，但是對於不同媒體、文類的組織中性別分工、媒體再現的效果、環繞在媒體再現的法律規範議題、乃至於這些議題在全球化、跨國脈絡下的意涵，乏人關注。「台灣的傳播學似乎還是不太能容納女性主義」；台灣傳播學中的性別與傳播研究除了媒體再現之外，似乎也未能展現對不同於此的题目的興趣，何以如此？

〈國〉文在本地相關主題的論述上分析了中文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相較於博碩士論文，由社群同儕相互審評、出線而刊出的期刊論文更能代表該學術社群當前研究議題的地景。因此，性別與傳播相關的期刊論文是什麼？有哪些議題？這些問題的答案有其學術社群與社會運動上的重要性。在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女性主義學術組（Feminist Scholarship Division）2002 年的新聞信上，Chris Demaske（2002）的專文就探討了女性主義學術與運動間持續的對話與辯論。女性主義的研究、理論從來不是與運動（activism）二分的，但是 Demaske 文中引述的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是研究者所在的機構體制的政治經濟結構而讓這學術與運動間的兩難浮上台面。不同的女性主義研究者發展出不同的因應之道，有的學者就經由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採用參與傳播、行動研究的方法，進一步探究與性別議題相關的 NGO 行動運動的結構、過程以及型態。這樣做，既增益學術發現，同時也以研究分析回饋行動中的團體與目標。然而，因為學術研究需求孔急，不同學界研究者爭先地與民間團體合作的結果也有後遺症——信任建立不易，而對合作對象的尊重以及目標的協商未必如民間團體的意，因此有的非政府組織對於自己的計劃、行動「被研究」變得保守、有所保留。除了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之外，有的女性主義研究者自己組成用以連結行動運動與學術的團體，像是在迦納的女性主義研究者組成了「發展與女性研究」（Development and Women Studies, DAWS），定期聚會，研究者彼此分享學術場域以及田野中的行動運動工作的連結。在 2002 年的新聞信上，學者提到藉由網際網路為研究發現發聲，同時也成立獨立的媒體中心用以發出與主流媒體不同的呼聲。這種在地發聲、跨國行動的新型態傳播是當時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可以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運動的平台和方式。文末，Demaske 再引述 Acker, Barry 與 Gsseveld（1991）年的文章指出，女性主義研究要能收解放女性之效，產製的知識必須能為女性所用、使用的研究方法不應該有壓迫性（not oppressive），同時，研究所具備的批判性觀點必須同時向主流

學術傳統提出質疑以及用以反思自己女性主義研究的開展。

從 Demaske 的文章述及的挑戰與提醒回頭看待〈國〉文呈現的本地中文期刊相關論文，〈國〉文發現主要的研究主題多環繞在傳播媒體如何建構事件或性別意象與其所涵蓋的性別政治。如果對照台灣社會媒體監督等公民團體對媒體的批評，學術場域此類題旨比重高，自可看成學術研究反映社會需求、呼應社會上重要題旨。但是從目前〈國〉文的呈現裡較難瞭解本地中文期刊論文是否還具有 Acker、Barry 與 Gsseveld 1991 年所提醒的兼具學術與社會實踐意義的條件。〈國〉文是在學術領域範疇析論性別與傳播研究的累積、發展與意義，但是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研究真要能遂行學術研究的意義，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必須同時從研究是否有解放意義的角度深入探究。

舉例來說，以「研究方法沒有壓迫性」而言，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權力位置常常是女性主義研究反思的課題，因此有的研究會在研究方法處、論文末，加上研究者在該研究設計與執行研究方法時對於自身位置與影響的反思；有的學術期刊會以研究方法紀要的方式特別呈現研究方法設計上與倫理考量、採行方式相關的文字。這些都可以視為呼應了 Acker、Barry 與 Gsseveld (1991) 文中對女性主義研究的提醒。因此，要從女性主義研究、性別研究此一學術領域的特定(自我)要求來分析學術成果時，可以考慮進入論文文本文脈，探析論文作者在學術作品中行動的意涵、作法、以及累積性別研究此上變化之後的整體結果，如此當更能凸顯性別研究的前瞻性。此外，跨國比較的研究也能從研究方法的面向賦予反思的意義，就目前分析看來，國內性別研究採行此法的也少。楊芳枝在〈國〉文中文期刊論文的分析中特別指出論述/文本分析是論文作者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總篇數中近半論文採此方法。只是，單是掌握了論述/文本分析為作者常用方法可能還不足以呈現本地性別研究者在方法設計與執行上的反思程度；探看過往研究的方法設計時，還要進一步瞭解現行主要研究方法是否在拆解文本上有不同於前的視角。

除了研究方法之外，就 Acker、Barry 與 Gsseveld 所言，研究產製的知識必須為女性所用，而〈國〉文顯示的是不論中文期刊或是博碩士論文，就主題而言，都是意象再現的主題比例較高。從社會運動的策略而言，值得進一步探看的是這些聚焦在「媒體再現」的期刊論文是否提出了不同於前、富含本地社會意義的批判角度？研究發現所凸顯的符號建構秩序有什麼樣亟待破除的社會秩序？論文倡議了什麼樣破而後立的新秩序？我們可以如何運用研究發現、改變權力位置？總而言之，在女性主義研究長年累積了為數不少的再現研究時，這顯示我們熟知的媒體再現符號秩序仍有待改進，但是「知道」本身不見得意味著「行動」，或者，「知道」而乏新意、「瞭解」但苦無對策，這樣研究產製的知識很難轉化為動能。因此，再現研究的切入點、研究方法、研究發現處處都應該以能啟動（inform）改變、轉化為目標。如果以此探看過去本地中文期刊與博碩士論文，不知除了題目集中在再現之外，是否時出的再現研究確實有著不同於既往的、運動上的應用意義呢？

再論本地性別研究中題目聚合程度。即使比例高的媒體再現研究從方法到產製的知識都富有解放的意涵，讓人還是不禁要問的是，本地性別研究中非媒體再現的題目哪裡去了？〈國〉文顯示性別與傳播研究在整個傳播研究圖像中比例低（十七年來估論文總數的百分之六），凸顯了性別與傳播研究的缺席、失聲。如果我們就聚焦在估期刊論文發表總數百分之六的性別研究論文，這近二十年來的相關研究一直重複同樣的基調，這意味著性別傳播研究主題光譜上「再現」以外的其他議題的缺席、失聲。箇中的原因似乎不能單以「台灣傳播學不太能容納女性主義」來解釋。原因何在？

〈國〉文在「肆、與國內相關學門期刊與碩博士論文比較」處，作者檢視了西文期刊性別研究論文與本地相關學門期刊與碩、博士論文的各面向比較結果。方法上，〈國〉文提出國內多採文本分析法，但是文本多樣性較國外研究為低。此外，方法上，跨國比較研究也少；其實從方法的角度，作者特別提出相較於西文期刊論文，國內性別研究上採取

「跨」(trans-) 的角度的論文少——無論是採跨國主義還是從多元文化角度交織性別與其他面向而研究的論文都比國外少得多。就議題論，作者提出再現與消費議題、情感議題（厭惡自己、欣羨她貌）都是國外方興未艾而國內文化現象已出但是學術研究仍希罕的性別研究議題。

楊芳枝的觀察其實在世界各地有關性別研究的新走向上已有討論。2000 年在義大利波隆那舉辦的針對身體、性別與主體性的歐洲女性主義研究會議上，幾位包括 Donna Haraway 在內的性別研究者在回應有關女性主義議題如何成為主流政治議題時，學者說到如果研究上、行動上我們論解放，我們要超越二元對立的思考——過去要不就是聚焦在特定階級、族群，要不就是認為人人都得享權力才得稱政治主體（Calloni, 2003）。Haraway 認為要注意行動中、不同經驗結盟而成的主體（intersectionality or conjunctual subjects），也要注意這類主體在跨國、全球化等促生各種網絡、行動的脈絡中的變化。Donna Haraway 以在全球各地血汗工廠中的婦女兒童為例，說明重要的研究課題；〈國〉文作者楊芳枝也以新自由主義風潮下各地以齊一樣貌打理自我的消費主體為例，說明全球化下的女性就是新課題。這都是將全球的與在地的脈絡帶入性別研究的佳例。

〈國〉文作者楊芳枝從研究論文的數量、主題上呈現國外與國內性別研究的異同，進而倡議傳播學者可以鼓勵研究生往更多議題發展。我則認為一個社會中學門領域的題目或聚或疏、方法或興或弱，除了是學界個人選擇，也是社會中學術社群的體質顯現。單就個別期刊或碩、博士論文題目觀之，或可就特定議題的或多或少提出該多該少的建議，但是如果從相關學術社群的動態來看，或可知該學群本身是否進行經常性的反思、討論，而由中發掘植基於本地社會、文化所不該或缺的主題。鼓舞、提醒學術社群中的對話，從而激發可行該行的研究方向，當較社群中一二人改弦更張意義來得更大，因為那意味著從事性別研究的社群見到了原本不得見之處，這更是進行性別研究社群對自己在學術研究上、在社會責任上的反思。〈國〉文作者提及國外的性別研究中「再現

總是和社會脈絡連結」，例如國外學者研究 911 事件之後的文本轉變、文本功能角色。其實，國外期刊論文除了在個別論文中將研究課題與社會脈絡連結，性別與傳播研究期刊更常有論文或論文專號構連研究主題與研究者自身所在的社群，從而進行有關性別研究與研究者的主體位置、挑戰因應的反思、對話。這種論文所反映的是除了研究「她」，性別研究者更研究「我」——我為什麼如是研究？我的社群有哪些變化？我們如何因應這些挑戰？何以故？

〈國〉文作者提到 *Feminist Media Studies* 大量出現後女性主義議題與實證研究。事實上，另一老字號的性別與傳播研究期刊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的 2009 年春季刊就著眼於後女性主義興起對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的多端影響，由幾位研究者分從不同立場申論研究者該如何往前走。主編這專號的 Karma Chávez 與 Cindy Griffin 提到二十年前（！）同樣一份刊物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的一期專號上，就有一群女性主義學者對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當時的路數、門派、狀態提問。Chávez 與 Griffin 認為期刊上的探析與當時像是 Lana Rakow 的作品 *Women Making Meaning* 劃定了八〇、九〇年代那保守壓抑的環境裡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的方向；容或反挫不減、容或右翼勢力高漲，但是對自身社群所處態勢的反思照亮前路。2009 年這專號的主編認為當前女性主義陣營矛盾日高，許多女性主義者面對彼此的差異，不知是否能一如二十年前，彼此對話，從而產生運動、前行的力量。

2009 年的專號裡，女性主義傳播學者們就在明知彼此大不同的情形下倡論身處後女性主義的年代，個人的（personal）依舊是政治的（political），我們應該訴求個人求變（Foss & Foss, 2009）還是植基在結盟上的主體（Rowe, 2009）呢？整個專號的生成延續當代西方社會後女性主義興起後愈演愈烈的女性主義是什麼/為什麼的論爭；而在有關運動與論述的位置的辯論之後，期刊專號的幾篇實證研究證成不同的位置長出不同的觀看角度、不同的分析路數。這一類的期刊論文、甚至是期刊專號在西方學術場域中屢見不鮮，甚至每隔十年二十年就會出現類

似反思研究社群所在位置與選擇的行動、研究策略的論文，從這樣的對話文化來看西方與我國性別研究主題、方向之別，可能就意味著某些性別研究題目的出現不是一二人的品味、興趣問題而已。題目與時代脈動扣得緊，而針對現下文化而興衰更迭的女性主義典範、研究者採行路數策略都能入文，成為相關社群的反思主題，這顯示了社會/社群、我（研究者）、與研究（行動）的三者關係是西方傳統中反思的主題；研究題目鮮少只是學術場域中的選擇而已。

Deutsch (2004) 在 *Qualitative Inquiry* 期刊上論述成為女性主義研究者的過程的論文中不斷提到在研究生階段從事田野工作時，就審視自己與被研究者、受訪者的諸般關係。Deutsch 提到這種相較於只端詳被研究者以及她所位居的世界，研究者更是時時檢視自己佔有的多重位置，而女性主義研究者總是不停歇地檢視、省思，這種自我反思 (self-reflexivity) 已經成為終身的習慣。所以，與其說性別研究中出現哪些題目，更重要的反而是性別研究中是否有些主題不曾缺席——研究者與研究將「自己」入文；不論什麼題目、方法，性別研究必須在研究前、研究中、研究之後檢視我與對方、與世界的關係，而這「關係」可能是以理論、以實證的方式展現，也可能是以前瞻行動、實踐的方式呈現。因此，相較之下，西方的性別研究論文主題多樣，但是論文題目的多樣性與研究者進行反思的一致性其實正源於學術社群勤於反省自己（社群）與社會的關係。

《中華傳播學刊》這次以發表與回應性別研究主題過往與未來議題規劃的角度促成性別與傳播研究領域中人反思我們做了什麼、我們在哪裡、要往哪裡去。希望這樣的對談能得見於本地不同的研究場域、運動場域，讓性別與傳播研究成為更有意識的作為。



## 參考書目

- Acker, J., Barry, K., & Gsseveld, J. (1991). Objectivity and truth: Problems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In M. M. Fonow & J. A. Cook (Eds.),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pp. 133-15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alloni, M. (2003). Feminism, politics, theories and science: Which new link?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0(1), 87-103.
- Chávez, K. R., & Griffin, C. L. (2009). Power, feminisms, and coalitional agency: Inviting and enacting difficult dialogues.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2(1): 1-11.
- Demaske, C. (2002).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An on-going debate. *Feminist/Con/text*, fall 2002.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ahdq.org/divisions/feminist/context/2002Fall/femScholarship.htm>
- Deutsch, N. (2004). Positionality and the pen: Reflections o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feminist researcher and writer. *Qualitative Inquiry*, Vol. 10, No. 6, 885-902.
- Rowe, C. (2009). Subject to power – Feminism without victims.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2(1), 12-35
- Foss, S., & Foss, K. (2009). Our journey to repowered feminism: Expanding the feminist toolbox.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2(1), 36-62

# We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Researched

Nien-Hsuan F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spond to the claims Professor Fang-Chi Yang poses in her article. The analysis of the recent publications on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in Taiwan reveals that most of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probl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s while the issues other than media representations are seldom thematized here. Focusing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pertaining to journal articles and graduate students' theses, this article raises the issue of the potential for emancipation conveyed by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and the need to further examine the methods adopted, the subjectivity targeted and also,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lliance created by the researchers with similar interests who sustain the feminist tradition of reflexivity in delving into the practice of researchers and the research.

智慧藏

\*Nien-Hsuan 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